

罗志田  
葛小佳

# 东风与西风

读书  
文丛  
精选



读书

文丛  
精选

# 东风与西风

罗志田 葛小佳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风与西风 / 罗志田, 葛小佳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6

(读书文丛精选)

ISBN 978-7-108-05935-2

I. ①东… II. ①罗… ②葛… III. ①东西文化—文集  
IV. ①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6307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目 录

- 1 新 序
- 2 修订版序
- 7 原 序
- 17 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
- 27 道统与治统之间
- 41 走向跨学科的新史学
- 48 “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
- 58 大胆的假设
- 68 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世事变迁
- 81 东风与西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梁启超
- 91 跨世纪的启示：从章太炎到古史辨
- 102 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
- 115 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
- 122 市场经济与乡村发展的新诠释
- 134 魏安德的中国工厂研究
- 144 形象与文化：换个视角看中国
- 155 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

- 164 谁的人文精神？
- 175 美国方式与美国梦：  
“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权势转移
- 188 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上下左右读书

## 新 序

这是一本合写的书，书中文字基本写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刊发在《读书》之上，后有幸纳入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今书店拟重新出版“文丛”中一些仍有价值的书，承编辑部同人的美意，本书也在其中。这次使用的版本，是201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所出的修订版。内容未作改动，仅订正了少数文字讹误。

作者之一的葛小佳已于2009年返归道山。本书的重印，唤醒一段段记忆，心情是纷杂的。相信小佳对本书的两次再版，会感欣慰。个人对于读者的不弃，尤深觉感动，也至为感谢！

为纪念小佳这位历史系七七级的杰出校友，四川大学于2010年在历史文化学院设立了以葛小佳命名的优秀论文奖，俾后来的学子知道他们曾经有过多么优秀的学长。与上版一样，本书的版税会捐给四川大学的“葛小佳优秀论文奖”。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重印此书！

2016年3月28日

## 修订版序

这本小书，所收的是葛小佳和我合写的读书心得，以及两三篇各自单独写的小文。本书初版时，小佳远在美国，当时的自序只能由我独自执笔。如今出修订版，小佳更远在天国，这个小序仍只能由我独自执笔。天有不测风云，最近一两年随时都在经历；人有旦夕祸福，不意也成这一两年亲历之事！所谓朋友，或许就是相见甚欢，不见亦如见，并不在朝朝暮暮。然而此后就真只能不见如见，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佳与我，相遇在四川大学。他在二班，我在一班，大概是通过戴思杰兄认识的，结果一见如故。思杰兄不住学校，后来更不常来学校，所以我和小佳的来往反多。那是我们一生的转折，不过当年似乎也没这么想，就是觉得读书已晚，所以稍更勤勉而已。读书之余的生活，也有不少的趣味。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遍寻成都大小饭馆去吃价廉物美的好菜。小佳从煤矿中来，带薪，那时可以说是高薪，所以吃完他付钱的时候要许许多多。他的另一业余活动是踢球，因此而结识不少朋友，有的也成为我的朋友。

我们的另一共同行动是学英语。我在入大学前只念过不到一年的初中，他的中学恐怕也不到常规水准。第一学期我是乱读杂书而过，小佳则似乎对未来有着某种预感。第二学期开学，他忽然对我说，他的英语已远远超过班上的进程。我们基本都是进大学才开始学英语的，忽然间彼此的水准就真正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了让我能赶上，他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我则拼命追赶，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又共同推进。到三年级时，我们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两名。没有那时的努力，后来恐怕就不能出去读书了。

当初在美国念完书，他也准备回来。然而那时葛公子亦杰不过几岁，多年在美国生活后，回中国竟然严重水土不服，几十天不能安宁，终于确定在海外定居。后来小佳事业有成，进入那一行的顶端，但心中似乎总有些许遗憾。近些年他一直在为国内的心理学界（特别是中科院的心理学所）做些帮忙的事，也因此让我们多了不少见面的机会。小佳当年以讲义气著称，也包括为朋友与人打架。造化弄人，自从他成了美国的名教授，义气仍在，而为人则斯文了许多。甚至到我家，也要到门外去抽烟，俨然一个外国君子。

小佳是绝顶聪明之人，学科对他似乎没有限制，反多借鉴。他本科学的是明清史，硕士改台湾史，博士则学社会学，毕业后从事心理学，很快以在顶级心理学刊物上频繁发表重要论文而著称。1996年，也就是他进入心



理学领域后两三年，他在《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 上发表 “The Developmental Interface Between Nature and Nurture: A Mutual Influence Model of Child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Parent Behavior” 一文，产生很大的影响，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后来又得美国家庭研究会正式表彰，誉为理论与研究结合的典范。该文现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引用达数百次。

他的专业论文均以英文发表，所以国内人或不了解其影响有多大。说点今日一般人所关注的：2002 年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请了十位对 21 世纪发展心理学有大影响的教授展望学科的前景，小佳便在其中。他曾是美国著名的 NIH (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 的项目评审人，那一位置有多么位高权重，内行都知道。他也是世界青少年心理学会的执行理事 (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并担任该会 2006 年年会的大会主席之一 ( co-chair )，清晰体现出他在那一领域的世界地位。今年三月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心理学会年会，特意为他举办了纪念会。

小佳一向为人低调，近年他做了很多为他人帮忙的善事，为朋友，为中科院心理学所，为各式各样的人，就是很少为家人，为自己。若他还在努力，我不会把这类世俗的名位挂在嘴上。但我们确实应记住，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华人心理学家。现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已将他帮助建立的行为遗传学实验室和少年双生子库命名为“葛小佳青少年发展与行为遗传实验室”，四川大

学也将在历史文化学院设立以葛小佳命名的优秀论文奖，让那些认真研究的学子得到鼓励，并知道他们曾有过眼界何等开阔的学长。

在美国那种讲究竞争的社会，凡有所成就者，专业压力都相当大。然而小佳不仅想着中国的心理学界，也没忘记他始终保持兴趣的文化和历史。他能写出本书所收入的这些文字，真正可说是“拨冗”而为。在我为初版写序的时候，他曾从美国来电话，特别提出要说明我们这些文字都是诚诚恳恳用心力认真写出的。这虽然有些像戏台上自己喝彩，却是出于对读者的尊敬，以及个人的自重。

本书各文的写作缘起，初版序言已略述及。今日不少享大名的海外学者，当年即由本书首次介绍到中国。近年不少青年学子对我说，他们对海外汉学的了解，就是来自此书。然此书坊间早已售罄，借阅则不甚方便。曾来联系再版的出版社，其实也有数家，过去都辞谢了。适社科文献出版社新推出“书与人丛书”，拟纳入其中。这次是故人出面，且小佳也忽然驾归道山，遂使再版之事不能不重新考虑。

这一次的修订，除订正文字讹误外，内容基本未作改动。初版中几篇针对今日学风士风的商榷文字，凡我所独撰者，在修订本中已删去。增添了一篇小佳评王汎森兄《傅斯年传》的遗作——《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是兆光兄据手稿整理的。回想我们合作的第一篇书评，也是评汎森兄青年时的旧作，或许即是一种缘分吧。

小佳匆匆离去，已经一年。本书的全部版税，都会捐助给四川大学的“葛小佳优秀论文奖”。所以我要衷心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提议再版此书！

2010年9月8日

## 原序

文化评论大约是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一种文体，比通常意义的“散文”或者要稍稍正襟危坐一点，但又不能严肃到像以前电影上的政委那样不苟言笑。如果用科举时代的文章标准来比拟，则考秀才时主要看文辞的美恶，文章要做得空灵；考举人的文章就要有点所谓书卷气，多少要体现一些学问，不能太空；而考进士则学问一面要求更高，需要在讲究文辞的基础上尽可能表现应试者的学问功力。文化评论大概就有些类似于举人的文章，要在淡淡的书卷气中依稀透出几分空灵，其实也带点我们中国文化特有的那种希望鱼与熊掌兼得的中庸意味。

今日文风不古，学术论文不少是文辞和学问都未必佳，固不必论。通常学问一面还过得去的学术文章，也大多不复讲究文采，能做到“辞达意”又“言能文”者，实在已罕见。而一般的散文似乎又不太离得开风花雪月（以雷锋为题材而能写出使人颇思一读的散文者，并世恐无几人）。这样的语境也许促成了文化评论这一介乎普及与提高之间的文体逐渐流行，恐怕也是立意于雅俗共赏的《读书》

杂志能够销量大增的原因之一。而《读书》杂志本身又有意无意间塑造出一种类似文化评论风格的书评体裁，即不必像专业书评那样必须准确概括所评书籍的内容，且所论有时也不一定紧扣原书主旨，常常可以借题发挥。

本书所收的是葛小佳（署名葛佳渊）和我（多数署名罗厚立）合写以及我个人近几年刊发的一些文化评论和读书心得，其中一半以上是刊发在《读书》之上。如今小佳远在美国，这个小序只能由我独自执笔了。我们都是“专业”且以专业为吃饭之“正业”的学人。有些专业方面的朋友是很反对花时间来写这类文章的，因为这多少总要针对和因应写作当时的学风世风，难以传之久远。但编辑方面的朋友则以为应该多写这类读者范围或更宽广的文字，以稍尽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良心。我们的这些文章，即是在《读书》杂志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头一两年似乎一度缺稿的情形下，受一位与《读书》关系较深的朋友之托而开始写作的。说句老实话，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专业压力都相当大，这些文字真正可说是“拨冗”写出。如果不是《读书》和其他刊物的编辑朋友（以及关心这些刊物的非编辑朋友）们的敦促，几年间要写这么些非专业的文字，实难想象。

但正因为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又多半是赶着写，其结果很可能是鱼与熊掌都未能得。对一些希望看到点“什么”的读者来说，这些文字恐怕已过于随意，甚至与“学术规范”有了距离；在另外一类读者看来，或者仍觉太过

迂远，书卷气还是稍嫌浓厚。好在我们并无像陈寅恪他们那样具有想要“转移一时之风气”的使命感（中国传统士人原无西方传教士那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汉代人所说的“澄清天下”似乎更多是指事功而言，宋以后的士人明显偏重“触及灵魂”层面的努力，我颇怀疑是受了禅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既不希图闻达（所以不用本名），也不奢望要影响什么人；既不敢云“提高”，也无意于“普及”。不过读书阅世，思而后有所得，希望借此以文会友，或者能从思想交换中获得一些进益，如此而已。

文化评论的随意性（与学术论文相比）似乎使写作略容易，唯在今日信息爆炸的时代，读者的时间和刊物的篇幅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有限。当此之时，若随意制造文字垃圾，真可以说是犯罪。故我们这些文字，虽然粗浅，却皆是诚诚恳恳用心力认真写出。我们写作的基本准则是不趋时、不趋世，有心得方下笔，不作无病呻吟，亦不敢逢场作戏。知我罪我，乃在读者。这一点小佳在电话中特别提出要说明一下，当然绝非自以为是，不过出于对读者和刊物的尊敬和个人的自重。依我们的陋见，文化评论究竟与抒情散文不同，写作时固然不妨比写学术论文更加“率性”一些，但既然是写给别人看（特别是有阅历不深的青少年可能要看），总以多少有点“作圣”的责任感为好（当然，若有意“作圣”，便会失真，这也非我们之所欲）。

本书之所以名为“东风与西风”，并不是觉得其中一

篇以此命名的文章特别好，而主要是因为多数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我们都是学中国历史出身，后来又多少受过一些西方的教育；深感不仅西方对中国有许多误解，在我们已经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国，国人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仍可以说仅及皮毛（包括《读书》在内的一些尚有地位的刊物，近年刊发的有些论及西学的文章，便时有“背塔说相轮”的情形）。更为不幸的是，同样由于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们的上一代人就已对中国传统甚感模糊，以后更是每下愈况，结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拿西方文化作我们的“传统”、而我们的“国学”家与“后学”家也依稀难辨的严重错位现象。

约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假如把“资产阶级”换为“西方”，这一预测与此后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发展实惊人地若合符节。

但西方“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却不仅是马恩所说的“商品的低廉价格”。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能力一起使西人的文化自信大增，同时也提高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人的吸引力。这在

近代中国有着非常充分的体现：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1903年的《自题小像》一诗中曾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而彼时开始兴起的尊西崇新大潮似乎至今未衰。

这一现象最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来解释。我们国内许多人对“文化霸权”理论的理解都有些偏于从中文词字望文生义，特别注重居于强势一方的强权控制。“控制”（domination）当然是文化霸权理论的一个关键词，但若只看见这一面，就陷入另一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的“单向度”（one-dimensional）思维模式。其实，文化霸权的形成与维持，不仅有支配群体及其文化强势控制的一面，而且有被支配群体因各种历史和时代原因对霸权文化大致接受甚而主动赞同的一面（这最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自在”而不“自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文化霸权”有些类似中国上古三代时的“共主”：其对从属者未必要求绝对服从，实则常常只要求承认其“共主”地位及不挑战即可。这期间还有许多细致微妙的讲究，读者可以去参考原书，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即“文化霸权”是“双向度”的。

当然，霸权下的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倾羨和趋附，也一直伴随着憎恶，在这一强势的形成依赖于非文化因素时，更是如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去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一书中论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非西方国家在追求以富强（特别落实于经济和军事力量）为标志的“现代化”时，它们竞相往西方寻求成功的秘诀；而在这些国家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后，又纷纷转而声称是其本土文化——而不是从西方寻来的秘诀——促进了它们的成功。亨廷顿因而推论：国家的富强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前些年关于所谓“东亚模式”经济发展的讨论，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述。近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学热”的同步，似乎也预示着类似现象的出现。

但是近代中国有着与其余东亚国家颇不相同的历史经验。在日本，“和魂洋材”说从来没有落到“中体西用”论在中国那样悲惨的结局（后者在中国思想言说中迄今仍是一个负面意义为主的“落后”术语）；近代日本许多“国学家”正是改革的促进派（其实中国亦然，不过因为当时还有更趋“新”者而显得“旧”），故“国粹”在日本基本不是一个负面词语。在韩国，由于曾经陷为殖民地，更加感到本土文化的珍贵，反传统的思潮虽也曾出现，却不像在中国那样成为主流。而在中国，部分因为强势文化采取了打压和劝诱相结合的策略（不一定是预谋的），尊西趋新及与此相关联的反传统观念在思想界长期居于（或隐居）正统地位，其流风不散，以至于今。

故中国传统的崩散远甚于日、韩等国，到今天恐怕只剩那些居于“深层结构”之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观念尚部